

目 录

烈士鲜血为党洒·····	甘 峰 (1)
抗战时期在曲江举办的党训班的情况·····	李景昌 (8)
曲江县两个不同时期的古代文化·····	刘子勤 (14)
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在曲江 (韶关)	
活动大事记·····	严 实 (23)
解放后曲江县报纸工作的沿革·····	丘富盛 (27)
谈谈解放前曲商业情况·····	于 青 (31)
谈曲江早期的女子教育·····	伍焕新 (36)
曲江县邮电史话·····	梁步均、谭寿养 (41)
曲江电影史话·····	杨树林 (48)
创办曲江县私立龙归中学概况·····	陈锡梅 (52)
话说曲江地貌·····	立 里 (57)
试述曲江县城的变迁·····	董坪申 (60)
建国前曲江县农村的民间借贷·····	张琼瑄 (65)
民主人士杨际春·····	甘 峰 (68)
罗坑乡土改的回忆·····	丘富盛 (73)

烈士鲜血为党洒

——曲江地下党员罗玉麟同志传略

甘 峰

罗玉麟，又名罗玉琛，曲江县马坝阳岗陈子园村人，192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曲江马坝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利用在国民党乡政府中任职的机会作掩护，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为了党的革命事业，他忠心耿耿，奋斗一生，为党、为人民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是我党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解放前夕，他曾任过马坝乡乡长，党内任中共马坝支部书记，牺牲时年仅44岁。

罗玉麟同志生于1905年。父亲罗云松早逝，母亲刘氏。童年时期，他家境贫困，靠母亲卖柴籾米维持生活。8岁时到邻村麻地岗韦永堂先生学堂读书，他天资聪敏，勤奋好学，在对吟诗作对尤感兴趣。15岁高小毕业后因家境困难，只得在家耕种，但仍坚持自学，颇有成绩，村中每办红白事都邀请他帮忙，他也乐意去做，深得人心。他与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深深体会到乡亲欲学无钱，欲耕无田，终年在饥寒交困之中挣扎的凄凉情景。地主恶霸对穷苦农民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从而使他产生了一股强烈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为以后投身革命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农民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在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之后，省农会指派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共产党员刘胜侣、侯凤墀来到曲江县指导农运工作。年仅20岁的罗玉麟，积极投身农民运动。同年7月，他被县农协筹备处选派参加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四期（旁听生）学习，开始接受革命的启蒙教育和军事知识训练，思想得到很大进步。结业后，他会同叶子芳、叶家强、陈锡光等农运骨干在马坝各乡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打土豪劣绅，开展减租减息的斗争。他经常亲自到松山下、小江下园、马坝安山等地农村去宣传和组织群众，对马坝农民运动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1926年2月，罗玉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下决心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1927年4月中旬，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在上海、广州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大批大批地搜捕和杀害共产党人，革命形势急剧逆转。这时曲江的地方反动武装随之亦紧急出动，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农会骨干，罗玉麟同志也被列入搜捕的黑名单之中。1928年秋一天，国民党得知罗在家里，便速派一百多名全副武装军警把陈子园村包围得水泄不通，挨家挨户进行搜查，由于罗玉麟巧妙躲避，使敌人扑了一个空。这时，敌人恼羞成怒，便对罗的家属进行迫害，将罗的母亲进行毒打，仍然得不到一丝线索，最后只得将罗的伯父罗云峰、哥哥罗玉成关押起来。此时，罗玉麟不得不悲愤地离家出走，漂流到鹤山、宝安和乐昌等地谋生，过着颠沛流离，风霜夜宿的凄凉岁月，尽管生活如此艰苦，丝毫也不能动摇他的革

命意志。

1933年，罗玉麟从外地回到家乡，受聘为村、乡小学教员，他为了多培育后一代，除白天教学外还兼办夜校，使不少贫苦青年得到入学的机会。

1938年春，广东省委派粤北联络员张尚琼到曲江恢复梁展如同志的党组织关系，并办理了廖宣同志的转党手续，随后由梁、廖二人为罗玉麟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不久，罗便当上了马坝区石溪乡公所书记（文书），协助乡长杨维常（共产党员）处理日常事务，是杨的得力助手。

同年11月，马坝抗先队成立后，罗就积极地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经常出入在抗先队部和“救亡书店”之间，并与杨维常、徐侠梅以及妇女生产工作团的同志一起，深入乡村夜校，教唱革命歌曲，进行抗日宣传。1939年9月，国民党曲江县政府为了削弱马坝抗先队的领导力量，便把杨维常调到周田区去担任区长，罗玉麟偕同地下党员陈乃仁、张洪等前往协助杨维常开展党的工作，使周田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

罗玉麟同志善于联系群众，团结党内的同志，共同搞好革命工作。1940年至1944年间，国民党当局不以团结抗日一致对外为重，不断制造事端、挑起摩擦，到处限制“异党”活动。曲江抗先队被迫停止活动以后，罗玉麟同志仍坚持为党工作，首先集资在马坝开设一间“胜利商店”，表面是经售生活用品和布匹，方便群众。实际上该店是我党的一个秘密联系点，又是联系和结交进步青年的场所。他随后还邀约杨维常以及民主人士杨际春、何卓儒等，先后创办起马坝消费合作社、马坝中学和中陂水利合作社，他自己亲自担

任马坝消费合作社和中陂水利合作社的经理，既利于业务开展，又利于联系革命同志，为发展革命事业开创了新的局面。

1945年1月，曲江沦陷，马坝被日军占领。日寇和汉奸到处鱼肉乡民，无恶不作。为了抗日保乡，副乡长罗玉麟带领乡公所全部武装进入苍村，同地下党员杨维常、陈乃仁、甘锦轩、陈志南等，团结进步人士杨际春，动员当地群众组织起抗日武装，成立了马坝抗日自卫委员会，罗玉麟任副主任委员。2月，联合乌石、沙溪的抗日武装，组成“曲江联乡抗日自卫委会”，罗兼任马坝办事处主任。在这期间，罗玉麟坚持党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团结一切愿意抗日的进步人士，积极协助委员会办好青年政治训练班，培养干部，加强了党对抗日武装的领导，在抗击日寇和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罗玉麟同志一直坚持党的地下工作。1947年8月以后，曲江的武装斗争蓬勃发展。国民党为巩固在马坝乡的统治，委派反动分子张秉枢为乡长，严重地威胁着我地下党开展活动和同游击队的联系。为此马坝地下党支部发动群众，争取开明士绅支持，成功地开展了一场罢免反动乡长张秉枢的斗争。罗玉麟服从党组织的决定，于1948年秋担任马坝乡乡长职务，建立起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中共马坝支部书记。革命重担压在肩上，他立场坚定，谦虚谨慎，紧紧依靠党组织，团结民主人士以及进步青年，共同战斗。他利用公开合法的身份，巧妙地掩护我党同志，提供情报，建立地下交通站，调整马坝乡所属保甲长，有力地支持了游击队的活动。

他对革命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对同志满腔热忱。从1948年起，罗玉麟的家庭成为我党的一个重要的交通站和传单、文件的油印点。由于受到革命的熏陶和革命热潮的影响，他的母亲和妻子都同情和积极支持革命工作。曲江地下党领导成员李凌冰、李子明等都以他家里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过一段较长的时间。罗玉麟同志经常教育家人要积极做好接待工作，把党的同志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在那白色恐怖的日日夜夜，他们一家人与地下党的同志们同甘共苦，相依为命，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罗玉麟遇事机警沉着，临危不惧。他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和怀疑。1948年3月，曲江县县长杨寿松接到马坝反动分子张毓秋的告密信后，立即亲率县自卫总队二三百人到马坝搜捕革命同志。罗玉麟对此早有警惕，及时地通知地下交通站做好应变工作，并布置所属的保长把已进游击区人员的户籍处理好。反动派虽然经半月之久的搜捕，但也是一无所获。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后，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追歼残敌，江南解放，指日可待。然而驻在曲江的敌人仍作垂死挣扎，加紧对我游击区进行清剿扫荡，在各区、乡大搞特务活动。我地下党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罗玉麟早已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一方面积极谨慎地安排好地下党的工作，为避开敌人的注意力，调换了一些地下党员的工作地点，在乡公所内部，则分派我武工人员监视国民党39军的便衣特务活动；另一方面，加强与上层人士的联系，打听敌人的动向。为了迷惑敌人，罗还到南华寺请虚云和尚收他为居士，并拍了合影照片，他把自己夫妇俩和虚云和尚的合照送

给当局一些头目，广作宣扬，以作掩护。

黎明前更黑暗，敌人更疯狂。1949年下半年，敌人对罗玉麟的活动加倍注意。时刻准备下毒手，面对这种险恶形势，罗玉麟更加警惕，及时将情况向党支部汇报，并在马坝当铺两次秘密主持召开自卫大队常备中队骨干会议，拟订出方案，准备乘农历八月初三“南华诞”，以维持治安为名，率领自卫常备中队起义，转入山区进行武装斗争。当他接到上级党关于暂不宜带队转入山区，要其就地坚守岗位、配合解放曲江的指示后，罗玉麟当即表示坚决执行党的指示，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他深深懂得，处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中，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但他仍保持镇定自若，一丝不苟地做好迎接解放曲江的准备工作。

1949年9月28日（农历八月初七日）国民党粤北警备区副司令率一批武装人员到马坝，阴谋逮捕罗玉麟并将马坝常备中队进行缴械。敌人不动声色，径直到马坝河背廖安记商店隐蔽，暗中派便衣特务监视乡公所，再通知罗乡长到“安记”会面。罗玉麟闻讯后，明知其中有诈，但为了不使敌人产生更大的怀疑，保存马坝地下党的同志和武装力量，他镇静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是乡长，又是后备大队长，在这关键时刻，不去见等于自我暴露”。说完，罗向同志们交代了一下，便随来人一同前往河背安记店。当他走到桥中间时，几个便衣特务如狼似虎地向他扑去，罗已来不及还手，身上的手枪就被收缴了，随即被挟持到安记店内扣留起来，然后，特务又赶到罗的住处逮捕了他的妻子陈慧贞。

罗玉麟夫妇被关押在曲江县警察局内，在狱中，他俩受尽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但始终坚贞不屈，视死如归，

保持共产党员的崇高风格，敌人无法从他们的口中得到半点党的秘密。凶残的敌人伎俩用尽，无计可施。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三日）把罗玉麟夫妇秘密地杀害了。

罗玉麟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他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保护地下党的同志，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在革命即将取得成功的关键时刻，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捍卫党的崇高利益。表现出一个优秀共产党员高风亮节的可贵精神。这正是：烈士鲜血为党洒，方有革命胜利花，英魂精神传后世，流芳千古众人夸。

抗战时期在曲江举办的 党训班的情况

李景昌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为了整顿和加强对广东党组织的领导，党中央派张文彬到了广东。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张文彬任书记，薛尚实（后为李大林）任组织部长，饶彰风为宣传部长，梁广为职工部长，尹林平任军委书记，麦蒲费（后为吴华）为青委书记，张越儼为妇女部长。中共广东省委的建立标志着广东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中共广东省委成立后，首先集中全力去抓党的建设，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和长江局关于“猛烈地十倍百倍地发展党组织”的指示，确立了“广东工作应以建党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广东省委在大力建立和发展党组织的同时，十分注意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狠抓党员教育，培养党员干部，其中采取的重要有效形式是层层举办各种类型的党训班。省委直接办班培训县级以上党员干部；各特委重点培训区和支部书记一级党员骨干；党员，特别是新党员的教育更是遍地开花、随时进行。这些党训班开设马列主义、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游击战争等课程，从实际出发，着眼于普及党的基本知识，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觉悟

和马列主义水平，增强组织纪律和革命气节。各级党的主要负责干部都分别到训练班讲课。从广东省委成立起至1940年4月的两年间，全省经过训练的县以上的党员干部有120人，区以上的519人，新党员一大批。经过办班较系统的学习，广大党员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增强了组织纪律性，大大提高了素质，有力地推动了当时抗日民族战争的发展，在以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中，各级组织和党员经受住了严酷的斗争考验。

本文着重就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广东省委、中共北江特委在曲江（韶关）举办党员干部训练班的情况作一概述。

（一）

中共广东省委在曲江共举办过三期县级党干训练班和一期特委书记马列主义研究班。

1939年3月中旬省委在曲江县城西河坝一位可靠农民的家里举办了第一期党训班。班址是一间只有20多平方米的矮小木板楼，条件较为艰苦。参加训练班的大部份是从广州撤离出来的“抗先”和广东省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的党员骨干，也有少数是粤北地区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的党员干部，共约30余人。他们是：黄焕秋、谢永宽、刘秉钧、岑掘雄、徐沂、邓如渺、李福海、英福技、林华康、周锦照、梁尚主、赵约文、王仲华、陆飞、林栋材、朱瑞瑶（女）、李琼英（女）、吴凤珠（女）、李玉华（女）、黎曼（女）、何筱静（女）、林焕（女）等。训练班班主任叫苏曼（化名王维），他曾留学日本，刚从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在省委组织部工作。训练班的组织工作由老红军、省委组织部秘书长黄松坚负责，大家称他“家长”。训练班学员成立一个支

部，岑振雄任支部书记，谢永宽任组织委员，黄焕秋为宣传委员。支部下分几个党小组，设正副组长。这期党训班学习的主要课程有：政治形势、马列主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游击战争、工农妇青运等。省委领导涂振浓、李殷丹、古大存、张越霞、吴华等讲课。学习生活紧张、团结、艰苦。党训班在五月份结业，结业时每个学员作了思想学习鉴定，并由省委分派各地担任党的领导工作。如岑振雄任中共曲江县委书记，徐沂任连阳三属工委书记，谢永宽任佛冈县委书记……他们为建立全省各区县的基层党组织，配合完成党的中心任务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1939年7月间，广东省委继续在曲江举办了第二期县级党员干部训练班。为了安全，避免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意，曲江马坝地下党支部协助省委将办班地址选择在离韶关10多公里的马坝演溪白马庙，后迁到演山谢屋举办，因为这里比较僻静，房间宽敞，群众的觉悟高，省委领导来去都较安全和方便。这期党训班是以“抗先干训班”的名义办的，学习时间三个多月。参加学习的同志除在战工队的干部外，主要来自翁源、佛冈、南雄等地，他们是张江明、吴震乾、林彩容（女）、雷毓彬、麦明、陈国英（女）、徐道昌、欧阳汝霖、夏冰（女）、蓝田、黄民康、徐青、关山、郭强、林名勋、郭彪、许足成、何俊才、廖琼（女）、陈华等约四五十人。班主任苏曼，工作人员有司徒丙鹤、朱明。省委领导张文彬、李大林、区梦觉等给学员讲课，开设的课程同上一期，但对游击战争一课尤为重视。

省委这期党训班得到曲江地下党以及演山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马坝党支部协同省委选择办班地址，参加护送学员

进出，办理伙食，采购药物，传送文件，掌握敌情。演山群众空出房子供学员住，协助买米运菜，还帮助放哨。由于多方的配合，这期学习班办了三个多月，进行顺利，没有出任何政治事故。

这期党干训练班11月结束后，省委紧接着又继续在演山举办第三期县级党干训练班。参加学习的人有余美庆、关山、陈火生、张凤楼、邬华、张华、梁琦、周天行、欧新、张英、李光中、游扬、叶文华、区德民，黎百松、陆冰、何达云、刘春乾、袁鸿飞、卢影等近30人，学习班由余美庆任支部书记，梁琦任宣传委员，黎百松为保卫委员。班主任仍是苏曼。该班刚开办不久，由于日寇进攻韶关，形势十分紧张，省委决定将班址转移。于是，同年12月初，学员分水陆两路同时转移去南雄继续学习。

1939年11月，广东省委召开第五次执委扩大会议。在会议前，省委将前来参加会议的各特委书记集中在曲江马坝办了一个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了10天。他们是：东江特委书记林平，西江特委书记刘田夫，中区特委书记罗范群，东南特委书记梁广，南路特委书记周楠、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赣南特委书记杨尚奎等7人。省委派宣传部副部长李殷丹负责给研究班讲课、作辅导。研究班以自学为主、省委宣传部拟有学习提纲，采取讨论形式，各人根据中心问题，准备发言笔记，然后联系斗争实际开展讨论。他们在10天里认真学习和研究了“民粹派”、“组织工作”、“战略与策略”、“辩证唯物论”、“公开合法与秘密工作联系”、“帝战”等6个专题，收效很好。

(二)

中共北江特委是在1939年7月间正式成立的，特委书记黄松坚、组织部长王炎光、委员有廖宣和谢永宽。特委一成立，便抓了党员干部的培训。在曲江举办的有两期。

第一期于1939年8月在曲江马坝鞍山马路下何屋村举办。参加学习的主要来自曲江、翁源、连县、佛冈等地的党员干部，他们是何俊才、林铭勋、许足成（以上三人由省委党训班中途转来）陈貽冀、肖少麟、余萍、朱继良、廖诗标、刘健芸、何国文等10多人。班主任是金阳。黄松坚、王炎光、石辟润等同志讲课，学习课程有政治形势、党的建设，统一战线、游击战争以及青年、妇女工作等。学习期间班内组织进行了“抗战必胜还是抗战必败”的辩论，学习结束时还进行考试。该班办了一个月左右。

第二期党训班是在第一期结束后紧接着举办的，大约在1939年10月间。在曲江马坝地下党组织的协助下，班址选在离马坝街六、七公里的水口水心坝的一间庙堂里。班主任仍是金阳同志。学员有李先士、梁庄宪、余珍、何春熙、何蔚儒、刘烈珍、英德有3个党员也参加学习，共10多名党员。当时省委训练班班主任苏曼、省委书记吴华和妇女部部长张越霞均到班讲课。学习内容重点是进行形势和马列主义启蒙教育。办班时间10多天。

中共曲江中心县委和1940年冬成立的中共后北江特委在曲江也举办过多次党训班，培训对象是党支部干部和新党员，鉴于当时形势和地下工作的秘密性，办班采取少、散、短方针不定期，流动形式，时间较短。

1940年春，中共曲江中心县委在曲江白芒若合村举办了

一期党员训练班，班主任李仲才，学员有郭坚、刘渥丹、李静等10余名新党员。该期党训班除学习党的知识，统一战线外还专门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为避免敌人的注意，在办班的10多天时间里，先后转移过几个村子。

1940年冬曲江中心县委又派出同志分别到基层党组织办短期党训练，讲形势，学党章，提高革命气节。如当时在曲江中学读书的党员谢绍武和罗洛伦便参加了三天，第一天与上级派来讲课的同志边散步边听课，第二天三人装着防空疏散，约好在东河坝雇了一艘小艇向湓江上游撑去，到曲江大铁桥的僻静处湾泊下来，在艇上上课。

1941年暑假，后北特委组织员林西平在曲江城南鹤冲乡仲元中学后山坟场树林中给仲元中学党员孔刚、凌宝惠等人办党训班，时间7天的下午。

这类党训班在1942年5月发生粤北省委被破坏事件以前一直坚持下去，没有间断过。

曲江县两个不同时期的 古代文化

刘子勤

曲江县地处北江上游，是南北交通枢纽，又是粤北的文化中心，究其历史渊源，可溯至十二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马坝人”及四千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峡文化”。现就其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古代文化分述如下：

马坝人

（一）发现经过

狮子岩是由两座石炭纪石灰岩孤峰构成。位于马坝镇西南2.5公里，因其形似狮子而得名，山中洞穴纵横交错，是曲江二十四景之一，名曰狮岩招隐。

1958年6月间，马坝公社组织农民于狮子岩溶洞中采挖堆积物作肥料时，挖出许多动物化石，适逢广东省委书记陶铸视察工作至此，当他看到这么多具有研究价值的化石时，即指示马坝公社党委副书记吴思浪将化石妥善保存。县及时报告省文化局，省局得讯后，即派员前来清理，并将标本带回广州。后经中山大学梁钊韬教授初步鉴定，认为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古人类化石，随即将标本再送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科学院派出裴文中、吴汝康、周明镇等专家

会同广东省文管会、博物馆、中山大学、广州市文管会等有关单位及省文物工作训练班学员60多人，再度前来曲江进行实地勘察和试掘，又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化石。马坝人头骨化石后经铀系法年代测定为12.9万年 $\pm$ 1.1至-1.0万年，属早期古人类类型的人类化石，因在马坝出土，故命名为“马坝人”。

（二）马坝人化石在我国人类发展史上的位置及其重要意义

人是从古猿进化来的，在人类进化系统上最早的代表是南方古猿，其后是直立人（猿人），从直立人发展到早期智人，然后到晚期智人（包括现代人）。

马坝人属于早期智人，也叫远古智人（过去叫古人）。近年来古人类学界一般将“古人”改称为早期智人，马坝人属此一类，它所处的时代是中更新世之末或晚更新世之初，考古学上为旧石器中期。因此吴汝康教授判断马坝人属于“早期古人类型”。概括地说，马坝人在人类进化中的位置，是我国古人类一脉相承的进化链条上的一环，可能是我国早期智人中较晚的类型，这与铀系法测定的年代也是相符的。

从地区上来说，我国的早期智人化石多发现于华北地区，马坝人化石发现于华南地区，直至今日，时过三十多年，它仍然是该地区的唯一的早期智人化石。它扩大了我国早期智人的分布范围，又填补了我国华南地区人类进化系统上的空白，增加了人们对东亚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了解。因此，马坝人化石的发现有着极其重要意义。

（三）马坝人的种族特征

从马坝人化石发现以来，随着资料的积累和研究水平的提高，不少专家特别注意对我国境内人类化石以至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人类遗骸的研究，不仅着眼于水平的阐述，而且作进一步对人类种族类型的探讨，已有不少论著。以这些论著作基础来认识马坝人的种族特征，确认马坝人在我国人种起源问题中的地位，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论题。

马坝人头骨化石经过修复以后，从其形态特征可以观察到它还保留不少原始性，如眉脊仍很发达，介于猿人与晚期智人之间；颅盖高指数41.6，介于猿人和一般晚期智人之间；前胸位指数40.6，介于猿人和晚期智人之间。据以上形态特征，确认是早期智人。我们还可以从如下诸点来观测马坝人的种族性状：

一是头骨呈卵圆形。

二是颅顶缝的前端，似乎是不复杂的深波到锯齿型的。

三是眉脊的外侧下延而与颧骨的粗厚的额颧突相续。从额突的方向判断，马坝人颧骨较前突，其颧面不可能朝向外侧方，这是蒙古人种的重要特征。

四是鼻根点和鼻额缝都较明显，鼻额缝呈水平走向，鼻骨较宽，鼻梁稍呈凹形。

五是鼻额角152度，显示其颜面上部相当扁平。

六是颅顶正中有类似矢状脊的结构。

七是眼眶缘呈圆弧形，眶指数88.0；属高眶型。圆钝而高的眶型多见于蒙古人种。

从上述特征分析，马坝人头骨属黄种人（蒙古人种）的种族特征是比较明显的。

（四）由马坝人时期的伴生动物群所反映的生态环境